

西北科學考察團與魯迅

金 濤

（中國科普作家協會）

前些日子，在網上查詢有關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資訊，意外地得知，當年中國科學家與瑞典大探險家斯文赫定合作進行的科考，一些當事人的遺物如今由他們的子女親屬捐給了魯迅博物館保存，引起我的極大興趣。

於是我向老友、曾任魯迅博物館副館長的王得後研究員詢問，他證實了此事確信無疑，因為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徐炳昶的子女向魯迅博物館捐贈遺物，王得後還參加了相關活動。得知我對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歷史有興趣，王得後先生立即熱情而慷慨地給我寄來兩本書，一本是《走向有水的羅布泊》（陳雅丹著，昆侖出版社 2005 年 5 月），另一本是《高尚者的墓志銘—首批中國科學家大西北考察實錄（1927—1935）》（王忱編，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5 年 6 月）。前者是考察團地球物理學家陳宗器的女兒、畫家陳雅丹為父親寫的傳記，後者是中方團長徐炳昶的女兒王忱等人整理的有關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歷史資料彙編，非常珍貴。

關於西北科學考察團，其全稱是「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時間從 1927 年至 1935 年，正如王忱的《高尚者的墓志銘》前言中所說：這正是「連年戰火、內憂外患，民生凋敝，科教衰落的苦難年代。」然而這次由中國科學家與瑞典大探險家斯文赫定合作組成的大型科學考察團，却是我國第一次以我為主，與外國平等合作的科學考察，當時雙方簽訂的 19 條協定，其中有「凡直接或間接對於中國國防國權上有關係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不得有任何藉口，致毀損關於歷史、美術等之建築物」、「不得以私人名義購買古物等」，另外，協定還規定原則上不進行考古發掘工作，但遇有小規模的發掘，「得由中國團長同外國團長執行之」，並規定考古「收羅或採掘所得之物件」，「統須交與中國團長或其所委托之中國團員運歸本會保存」等等。這些條款，一改清末以來外國探險家、科學家在中國境內暢行無阻，任意發掘、考察，並將大量文物和動植物標本掠至國外的屈辱歷史，成了以後外國人來華考察與我國簽約的典範，其意義十分重大。

《高尚者的墓志銘》全文收入中方團長徐炳昶的《西遊日記》（該書的最早版本，30 多年前我在琉璃廠中國書店見過，現在已是很稀罕的了）、中方地質學家袁復禮的《蒙新五年行程記》以及楊鍾健、袁復禮合作的《天山龍發掘經過》；地質學家丁道衡的《綏遠白雲鄂博鐵礦報告》，氣象學家劉衍淮、李憲之關於氣象觀測的回憶，地球物理學家陳宗器的多篇考察報告。考古學家黃文弼學術成果甚豐，著作已分別出版，該書僅提供考察報告目錄。此外，書中還收集了當年協商成立科學考察團的新聞報道和有關消息、往來信件、簡報，以及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報告和斯文赫定撰寫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誕生經過》等原始文獻，彌足珍貴。

西北科學考察團組建時共有團員 28 人，其中中國隊員 10 人、瑞典團員 6 人、丹麥隊員 1 人、德國團員 11 人。後來又各增補隊員 5 人，先後共計 38 人。

金濤，前科普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著名科普作家、科幻作家，電郵：jintao1940111@163.com

在為期 8 年的考察中遇到的困難，除了自然條件的惡劣，主要還在於當時中國西北地區政局動蕩及中央政府的政令根本無法下達的混亂。即便在這種情況下，考察團在許多學科領域都取得了不尋常的成績，填補了許多學科的空白。

例如中國年輕的地質學家丁道衡在包頭的白雲鄂博發現的大鐵礦，分析了該礦成因，當時徐旭生就估計道：「或將成為我國北方的漢冶萍」。目前，在白雲鄂博鐵礦的基礎上建立了生產能力巨大的包鋼，而且在礦區發現有豐富的稀土礦藏，使包頭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稀土金屬產地。包鋼為丁道衡樹立雕像，以紀念這位地質學家的卓越貢獻。

又如地質學家袁復禮在新疆準噶爾盆地發掘出包括 7 個新種的 72 具二齒獸、恐龍等爬行動物化石，使我國的古生物研究躍上一個新臺階。著名古生物學家楊鍾健認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國猿人之發現以下。」袁復禮為此獲得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北極星獎章。瑞典一地質學家曾對斯文赫定說：「你們費巨款作考察，即使只得此一件大發現，也屬不虛此行了。」

另外，對羅布泊的實地考察，地球物理學家陳宗器和霍涅爾、那林對湖區的測繪，斯文赫定和陳宗器駕獨木舟從孔雀河進入羅布泊考察，都是前無古人的。此外，在地圖測繪、氣象觀測、地磁、動植物標本采集、人種學等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績。陳宗器等所繪製的羅布泊地區第一幅實測地圖，其精密度為後來美國衛星圖像所證實。陳宗器先生也是國際知名的羅布泊學者，中國地磁學的奠基人。

除了自然科學領域的巨大收穫，人文科學領域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績：瑞典的貝格滿博士在額濟納河流域，發掘出上萬枚古居延的漢簡，這就是聞名於世的「居延漢簡」，是研究漢代文化的珍貴考古資料。

黃文弼對古高昌國遺址、羅布泊北岸西漢烽火臺遺址（土垠遺址）的考古發現、貝格滿、陳宗器對羅布泊地區小河及樓蘭古城等多處的考古發現，都是西北考古的巨大收穫。

除了科考的成果，這次科學考察在人材培養方面也是值得一提的。考察團的 4 名氣象試習生是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中錄取的，分別是馬葉謙、崔鶴峰、劉衍淮、李憲之，在德國氣象專家郝德措導下，他們很快學會獨立從事氣象觀測。以後李憲之、劉衍淮完成任務後，入柏林大學深造。李憲之根據實際觀測資料進行研究，發表博士論文《東亞寒潮侵襲的研究》，以後又找到颱風的成因，成為著名的氣象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劉衍淮在柏林大學獲博士學位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後在空軍從事氣象教育，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教授。

附帶提一句，上個世紀 50 年代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李憲之先生教過我們氣象學。

現在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魯迅與西北科學考察團究竟有什麼關係？

魯迅與考察團並無直接關係，這是肯定的。但是魯迅的兩位好朋友却是這次中外合作科學考察的關鍵人物：一位是劉半農（1891~1934），又名劉復，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文學家、語言學家、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1920 年到英國倫敦大學學習實驗語音學，1921 年夏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學習，1925 年獲得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他是當時成立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推舉的常務理事，西北科學考察團名義上是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組織的，劉半農負責與斯文赫定、與中央政府聯絡的具體工作。19 條協定便是劉半農與許多中國學者努力的結果。

另一位就是中方團長徐炳昶。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唐縣人，著名的史學家，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攻讀西洋哲學。學成歸國後，先後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教務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1949 年後，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著譯甚豐。1927 年，徐旭生擔任了「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

的中方團長。他知識淵博、為人正直、不卑不亢、意志堅定，臨危不懼，贏得全團中外隊員的欽佩，也為全團克服困難、團結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礎。考察期限由 2 年延至 6 年（1927~1933），在我國西北部約 460 萬平方公里的區域內進行多學科考察，取得了轟動國際學術界的考察成果，是與徐旭生的領導才能分不開的。

徐炳昶與魯迅早有文字之交，魯迅的《華蓋集》收有《通訊》一文，即是魯迅與徐旭生往來的 4 封信，時間分別是 1925 年 3 月 12 日、3 月 29 日（魯迅致徐旭生），徐旭生致魯迅信則是同年同月的 16 日和 31 日。這是徐旭生主編的《猛進》創刊不久魯迅給徐的信，信中提出針對中國的現狀，「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除此沒有別的法。」「但我希望於《猛進》的，也終於還是『思想革命』。」信中也交流了對國民性的看法和辦報刊的想法。魯迅非常有名的、經常被引用的一段名言，關於如何辦通俗的科學雜誌：「單為在校的青年計，可看的書報實在太缺乏了。我覺得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要淺顯而且有趣的。可惜中國現在的科學家不大做文章，有做的，也過於高深。現在要 Brehm 的講動物生活，Fabre 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並且插許多圖畫的；但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至於作文者，我以為只要科學家肯放低手眼，再看看文藝書，就夠了。」這一段話便是出自魯迅給徐旭生的信。

1927 年，徐旭生擔任「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中方團長，與斯文赫定率團出征，以及此前中國學術界維護國家主權的努力，這些頻頻見諸報端的消息，魯迅是知道的。在《徐旭生西游日記》出版時，作者在「叙言」中寫道：「東歸以後，東方雜誌的編輯曾由我的朋友魯迅先生轉請我將本團二十個月的經過及工作大略寫出來，我當時答應了，可是遷延復遷延，直延到一年多，這篇東西還沒有寫出來，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現在因我印行日記的方便，把這些東西補寫出來，權當作日記的叙言，並且向魯迅先生同《東方雜誌》的編輯表示歉意。」由此不難看出魯迅先生對於這次中外合作科學考察的重視。

還有一件事與這次科學考察並無直接關係，而是由於斯文赫定與劉半農從「不打不相識」轉而兩人之間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誼，於是衍生出斯文赫定與劉半農相商，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劉半農是魯迅的老朋友，認為斯文赫定的建議未嘗不是件好事，便託魯迅的弟子台靜農寫信探詢魯迅意見。魯迅收到台靜農 1927 年 9 月 17 日的來信，當即於 9 月 25 日回復了台靜農，予以婉拒：「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事，也是文學史上鬧得沸沸揚揚的一樁公案，這就不多說了。

這裡附帶說幾句，關於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歷史和它在近代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很長時間是被忽視的。正如王忱的《高尚者的墓志銘》前言中所說：「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這個在我國科學考察史上有著劃時代意義的考察團，卻被拋在了歷史遺忘的角落」。因此，我希望這篇小文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科學史界對這一段歷史的關注，恢復歷史的真面目。

收件日期：2010 年 5 月 23 日